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推动儒家文化“走出去”行稳致远

□ 向芬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新时代新征程，中华文明正以更加博大的胸怀拥抱世界。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要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中提出，要构建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建设全球文明倡议践行机制。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因其独特魅力和深厚底蕴，是世界文明的灿烂瑰宝，也是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面对新的挑战，未来在儒家文化的传承和交流中，要发挥好各种中间桥梁的作用，唯有以心相交，才能成其久远。

儒家文化对世界文明影响深远

毋庸置疑，儒家文化对世界文明影响深远。在东亚，日本、朝鲜半岛等地都有祭孔的传统。韩国国立民俗博物馆收藏的一组文字图屏风画面精美，上书“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等大字。此屏风图文结合，以儒家思想为主题，充分体现了韩国社会对儒家文化的传承与重视。

儒家思想不仅对东方文明产生了深刻影响，还跨越重洋传到欧洲，为西方启蒙运动注入思想灵感。在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曾经评价孔子所提倡的思想，具有与“牛顿万有引力定律”一般的普遍性。伏尔泰本人也被日本思想家福泽谕吉赞誉为“欧洲孔夫子”。而在当代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迈克尔·普鸣凭借讲授孔孟学说，一度成为学生追捧的“网红”。

在儒家文化赓续传承中，以华人华侨、华人社团、华文报社和华文教育为桥梁，圣贤思想跨越时空、跨越国界实现了文明交流互鉴，赢得了国际友人的理解、尊重和信任。海外华人华侨的积极响应与支持，使得儒家文化所蕴含的思想体系、价值准则等“观念性形态”与当地文化互补互融，同时其承载的生活方式、传统节日等“实践性形态”也和在地族群相交相融。

不过，在当今世界范围内的儒家文化传承和文明交流互鉴受到了严峻挑战——

一是，一些政治势力或极端团体对中

■毫无疑问，展示型、灌输型的“交流”已无法达成“交流”，更无法形成“互鉴”。未来在儒家文化的传承和交流中，唯有以心相交，才能成其久远

■在面向海外传播儒家文化时要把握重点、删繁就简，主动降低文化语境。比如，结合地域文化核心特征，打造简单易记、特色鲜明的儒家文化标识、文字符号来加强文化识别，形成文化品牌。山东提出的“一山一水一圣人”就是具有高辨识度的文化符号，“孔子文化节”“妈祖祭典、黄帝陵祭典和祭孔大典”也已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标志性文化品牌

华文化传承活动予以抵触，这暴露出某些国家和地区残存着的种族偏见。比如，美国国会众议院所发起的针对“中国利用‘孔子课堂’影响美国中小学教育”的听证会，引发了有关种族主义、反亚裔仇恨的辩论。

二是，某些国家不断炮制所谓“中国威胁”“外来文化渗透”“文化入侵”等论调，并刻意制造矛盾冲突。过去，推崇儒教的朝鲜、日本和越南等亚洲国家都有兴建孔庙的传统，但如今兴建孔庙时，却会被视为复兴旧制度与迷信，同时，还将孔子看作与本国籍无关的历史人物。

三是，一些国家受到强制同化政策遗

绪的影响，部分华人华侨所秉持的中华文化特性随着时过境迁越来越淡薄，中文水平、身份认同和文化认同代际差异愈发明显，尤其是新生代华人华侨与中国的情感连接更为弱化。

多途径促进文明交流互鉴

习近平总书强调：“文明交流互鉴是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人类始终在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相遇相知中向前发展。”各国各代的华人华侨对儒家文化的认同和传承存在一定的差异，文明交流互鉴的有效模式始终需要不断探索。毫无疑问，展示型、灌输型的“交流”已经无法达成“交流”，更无法形成“互鉴”。未来在儒家文化的传承和交流中，需要以心相交，才能成其久远。

第一，健全文化交流机制，畅通文化交流渠道，形成多元互动的儒家文化交流互鉴平台。过去，在儒家文化影响下，华

人华侨主动发起回到中国寻根祭祖的民间行为，中国政府也全方位支持跨国文化交流活动。一系列针对青少年的“寻根之旅”“祭祖祭孔”“研学夏令营”，邀请华裔青少年来中国进行沉浸式的体验活动，起到了让儒家文化入心入脑的效果。未来，在那些对儒家传统价值理念接纳程度高的国家和地区，应积极畅通互学互鉴的渠道，深入开展教育、科学、文化、旅游、考古等领域的合作，加强议会、政党、民间组织、学校、媒体等机构的往来，密切妇女、青少年、网红和企业家等群体的交流。通过文明论坛、经典译著、文艺演出、展示展览、民俗体验等方式，打破国际交往的壁垒，促进儒家文化在交流互鉴中发扬光大。

第二，打造网络文化矩阵，丰富儒家文化的传播元素，打造便于广泛传播的文化符号。儒家文化除了带有正统性、严肃性的观念形态之外，还有许多接地气的实践形态值得去推广。儒家文化传承和交流互鉴既可以体现“黄钟大吕”“高山流水”，也可以展现“下里巴人”“人间烟火”，应充分运用社交媒体、短视频平台、自媒体以及流量网红等传播手段，利用科技、戏曲、民乐、手工艺等文化元素，充分鼓励和调动青年人的能动性和创新性，与时俱进打造具有儒家文化特色的周边产品和生活方式。近年来，国内诸多视频平台已成功“文化出海”，B站、腾讯视频海外版WeTV、爱奇艺国际版iQIYI等陆续在东南亚主要国家落地，因地制宜推出不同内容和语言版本的本土化应用程序，吸引了众多东南亚网民对中国文化的关注。在此“文化出海”过程中，华人华侨作为本土创作者和推广者，可以帮助平台企业克服语言障碍，了解

民众需求，弥合文化差异，生产更有针对性的、可观可感可玩的文化产品，在开拓海外市场的同时增强儒家文化的影响力和感召力。另外，在面向海外传播儒家文化时要把握重点、删繁就简，主动降低文化语境。比如，结合地域文化核心特征，打造简单易记、特色鲜明的儒家文化标识、文字符号来加强文化识别，形成文化品牌。山东提出的“一山一水一圣人”就是具有高辨识度的文化符号，“孔子文化节”“妈祖祭典、黄帝陵祭典和祭孔大典”也已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标志性文化品牌。

第三，大力支持华文教育，提高语言教学水平，提升文化传承和交流互鉴意识。实际上，随着中资企业对外投资和业务的快速发展，他们对于本地人才的需求不断上升，并且中资企业的工资待遇普遍高于当地职业薪资，因此不仅华人华侨有中文学习的长期需求，本地人才也有强烈的中文学习动机。华文教育是传承儒家文化、达成民心相通的重要平台，华文教育既可以让世界民众通过儒家经典文献研习凝练精妙的中文语言，也可以润物无声地领会到儒家文化的价值观念、道德规范等传统精髓，还可以通过儒家经典故事和中国发展理念的讲述让世界民众了解一个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华文教育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目前需要解决现存的教师、教材、教法问题，出台一些优惠便利政策和灵活的管理体系，处理好孔子学院、华人社区、华教机构、华文媒体和华商组织的关系，形成稳定、持久、良性的华文教育发展格局。

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世界上不同文化和文明都需要各个国家和各个民族代代相传，在平等交流、学习和借鉴基础上，才能深入了解不同文化特质、挖掘文化间的同质元素、触发文化共情心理、深化互信互动效果。儒家文化承载着赓续中华文脉的嘱托，夯实了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文基础。未来，需要充分利用各种传播渠道来连接不同国家和地区，促进全球文明交流与互鉴，让儒家文化的独特意蕴、精神追求和思想光芒抵达更多人的心灵，让世界人民享受更丰富内涵的精神生活，开创更有选择的文明图景。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新闻学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当今社会，我们还需要礼乐文化吗？

礼乐文化的时代新生

□ 房伟

他纳“仁”于“礼”，为礼乐文化的赓续发展找到了“仁”这种普遍化、内在化的价值支撑，赋予了礼乐文化以全新的生命力。

孔子之后，礼乐文化的精神与中国传统社会的结合是全方位的，既有国家制度层面的渗透，又有日常生活层面的融合，可谓“耳闻目见，无非是礼”。从国家层面看，国家制度的礼乐化集中体现为“五礼”体系的建构与延续；从社会层面看，日常生活的礼乐化则表现为中国传统礼乐型生活方式以礼乐为基本特质。总之，透过礼乐，在不断变换的时空里，在冠、婚、丧、祭的场域下，在坐、立、行、走的仪轨中，人们可以亲身体会仁爱敬的深意，时时涵泳其中，将之内化于心，外化为行，成就了独属于中国人的礼乐人生。

不可否认，历史上，随着传统社会的僵化、解体，礼乐文化也逐渐失去了活力，对社会发展的影响由积极转向消极。这一历史过程也影响了今人对礼乐文化的认知，以至于在今天一提到礼乐文化，就有人认为是“封建糟粕”，与人平等的现代理念相背离，或是将原本具有丰富而深刻内涵的礼乐文化片面等同于磕头、作揖等古代礼仪形式。这些都是对礼乐文化的误解和偏见。当前，我们急需充分重视并且深入有效地普及礼乐文化知识，努力建构与当今时代精神相契合的新型礼乐文化。

礼乐文化的精神特质

我们在新时代重视并重构礼乐文化，并不是为了回到古代，而是要守正创新，积极推动礼乐文化的现代转型。为此，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通过对礼乐文化内涵的阐释，揭示其精神真谛，从而发掘其与现代社会契合点。在综合前人成果的基础上，结合自身的研究与体认，笔者认为，礼乐文化之生命力、真精神，可以用“仁、敬、序、别、理、情、时、中、节、谦、让、和”十二个关键字加以概括。

从价值立场看，礼乐文化具有仁、理、情、和等精神特质。“仁”是礼乐的内在本质，礼乐则是“仁”的彰显。如果没有仁德，礼乐就会流于形式；反之若没有礼乐，仁德也很难呈现；“理”是礼乐的天然合理性所在，礼乐的制定应是合乎天地之道，只有本于伦理、体现天理才能“礼理双彰”；“情”是礼乐的根基，礼乐要建基于真情实感之上，要顺乎人之常情，无情而守礼，礼乐就会流

于虚伪；礼乐文化的最高价值体现在“和”，中国文化是崇尚“和”的文明体系，要追求“情理交融、美善合一”的境界，自然离不开礼乐的滋养与熏陶。

从价值追求看，礼乐文化具有敬、序、时、中等精神特质。“敬”是礼乐的内在精神，礼能够涵养人的敬畏之心，敬畏之心又是恭敬之行的根基，要做到彬彬有礼，就应该时时刻刻将敬放在首位；“序”是礼乐之宗旨，礼乐本源于某种符合天道的规则与秩序，同时它又能够维护有规则、有秩序的状态，以保障最大多数人的利益；“时”是礼乐之灵魂，礼俗、礼仪和礼制要“因时制宜”“与时偕行”，不断变革以符合时代精神，保持其合理性；礼乐的神韵之处集中体现为“中”，“制礼”需要“守中”，同时“行礼”则可以“得中”。

从价值规范看，礼乐文化具有别、节、谦、让等精神特质。“别”为礼之用，礼承认自然界及社会中的差异性，礼同时又认识到“别异”所造成的对立、隔阂，礼乐相辅相成，能够实现多元差异之间的和谐共处；“节”为礼之效，礼乐的出现，正是人对动物本能的一种抑制，也是人的文明意识的觉醒；“谦”为礼之德，谦既是儒家君子最重要的品质，同时也是“一种处世智慧、处世之道”，“让”体现的是君子的胸怀和风度，恭谦礼让，与人为善应当成为现代社会不可或缺的精神风貌。

礼乐文化的时代价值

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积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是推进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路径。作为中华文明的主干，“礼乐”可以“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左传·昭公十一年》）。传承发展礼乐文化，能够为新时期精神文明建设提供丰富的思想资源，礼乐文化在今天仍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

第一，传承发展礼乐文化有助于塑造当代中国人的精神品格，提升国民的文明素养。礼乐文化蕴含着丰富的道德资源，体现出鲜明的人文精神，同时它还是道德实践的载体，承担着塑造人格的教化功能。礼乐文化中“父慈子孝”“兄弟恭”“仁爱友善”“相敬如宾”“宽容礼让”等价值理念，依然是当代社会需要遵循的道德准则，是支撑人们向上、向善的精神源泉。传统礼乐文化经过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融入时代

精神，一定能为塑造当代中国人的精神品格作出更大的贡献。

第二，传承发展礼乐文化有助于增强社会凝聚力，激发昂扬向上的精神力量。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是凝聚人心的精神纽带。作为中华民族最独具特色的原创性文化之一，礼乐文化的特殊性在于，它不仅在精神内涵上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一脉相承，同时它仍以礼仪、礼制、礼俗等外在表现形式，使文化的内在精神得以具体化、形象化和生活化，让每个人都能感知、领悟，从而激发出强大的精神力量。如“七一勋章”颁授仪式、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颁授仪式、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在凝聚力量、教化人心、鼓舞士气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彰显着礼乐文化的时代力量。2019年10月1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这次庆祝活动是“国之大典”，并给予“气势恢弘、大度雍容、纲维有序、礼乐交融”的高度评价。礼乐文化在新时代所具有的精神凝聚力、价值引导力和内在推动力，由此可见一斑。

第三，传承发展礼乐文化有利于推进文化自信自强，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党的二十大报告作出“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的重大部署，提出“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的要求。礼乐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文化精髓，与中华文明所具有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五个突出特性深度契合，延绵不绝地传承着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追求、价值体系、行为准则和生活样态，成为中华民族能够始终保持自立的有力支撑，也是我们今天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同时，礼乐文化所具有的愉悦性、审美性，能够满足人们的心灵需求，这对于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从而有效增加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力，都是非常有帮助的。

清儒颜元曾言：“国尚礼则国昌，家尚礼则家大，身有礼则身修，心有礼则心泰”。体现着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中国风采的新时代礼乐文化，一定能够成为赓续中华文脉、建设文化强国的重要资源和持久动力。

（作者系孔子研究院研究员、礼乐文明中心副秘书长，山东孔子学会副秘书长）

“两创”漫谈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植根在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直接决定着人们的“生活方式”。正如中国著名思想家梁漱溟所言，文化是一种生活的样法。当我们提倡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候，其实就是在提倡一种“生活的样法”。当我们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时，其实就是要让我们的日常生活发挥实际作用，而我们的日常生活也一定要充满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生发”意味的“文化生活”。

同向同行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三大组织支柱：家庭、学校和国家，其与日常生活具有内在一致性，二者都以实践、致用为价值前提，以实现政治理想和个人发展相统一为价值追求，特别是“人民中浸染着的儒家伦理观对于学术的肇发，仍被证明是其发展活力和适应能力的源泉”。

就价值前提来看，文化的本质是“人化”，而生活的本质是“为人”。文化自始至终反映着人的生活，也会因人的生活变化而变化。在马克思主义看来，“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人的生活是在物质生产实践基础上形成和展开的人的生存状态或人的实际活动过程。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而言，它始终将人们的现实生活作为最重要的实践场域，孔子提出的“六艺”，主要是实践性的功夫，而非理论性的技巧，因为它们属于能力的范畴，而不是知识的范畴。“经世致用”也是极具实践意蕴的思想，在当时主要表现为建立“士人政府”的实践指向，再到宋明理学的“知行合一”“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这也是对实践哲学的进一步深化，主要体现为一种道德实践。立足现代生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精神营养，“对历史文化特别是先人传承下来的道德规范，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

就价值追求来看，文化的指向是“化人”，而生活的指向是“为人”。文化的价值在于“以文化人”，往往这种教化是与国家政治理想和社会治理紧密嵌合。作为中国传统社会正统的儒家思想立足于现实生活，通过道德感召、伦理塑造和秩序规范对民众实行社会教化以实现“民善而国治”的理想。需要注意的是，教化的关键是“德化”。《大学》开篇即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此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其主导力量的自我成长，这种文化主体性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下，中国式现代化所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突破了资本主义文明对“人”的宰制，超越了西方社会的“经济人”和“单向度的人”，真正追求“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这一点与日常生活中所追求的美好生活的目标是一致的。

融通聚合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承载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发展形成的价值共识，反映了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积淀，塑造了中华民族特有的生活方式。而生活方式是指人们一切生活活动的典型方式和主要特征的总和，包括饮食起居、社会交往、精神生活等方面。

古代物质生活传统来看，古代的许多思想家都主张人们精神生活富足要立足于物质生活富裕，因此，在几千年的历史演进中，积淀了丰厚的物质生活传统。“仓廩实则知礼，衣食足则知荣辱。”（《管子》）孔子在其与弟子冉有的对话里提出了“庶—富—教”的惠民顺序，孟子继承了孔子的理念，他认为只有在使物质得到充分保障后，才可能“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在物质生活中，衣食住行是社会生活最基础的环节，其中，饮食文化是与生活最为紧密的传统。当下，饮食选择愈发多元，但我们的饮食传统的基本框架依然稳固。菜品制作上，传统的煎炸炒烧、煎煮蒸烤依然是主要烹调方式；口味偏好总体上仍然追求传统的五味调和，地域性的口味传统如“南甜北咸”等也依然保持；筷子、杯子、盘子以及同席共食的习俗依旧未变；依旧保持老人、客人上座，晚辈、主人陪侍的餐桌礼仪。

就社会生活传统来看，中国传统社会是礼俗社会，当代社会虽然已进入现代法治社会，但在日常生活中依然有礼俗传统的印迹。儒家思想以仁、义、礼、智、信为道德行为准则。《蓝田乡约》中写道：“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安，患难相恤。”人们在乡村生活共同体中，在生养、规约、礼俗、患难等方面，相互激励、监督、交往、救助。这种互助互惠人情交往方式是宋明以来中国乡村社会的主流交往传统。虽然近年来这种传统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和乡村治理模式嬗变而趋向淡化，但在婚嫁娶中，人情互惠传统仍普遍存在。此外，婚嫁嫁娶作为一种重要人生礼仪，虽然歷經改易，但基本精神与主要环节仍然活态存在。

就精神生活传统来看，正所谓“百姓日用而不知”“万方百姓恒日日赖于此道而得生而不正”，精神生活层面的传统是“润物细无声”的，也是文化传统的核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突出表现为“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当下，人们的生活方式仍然深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蕴的精神传统的影响，主要体现为中华民族最深层次的精神追求和价值取向，比如诚实守信的立身原则和自强不息的人生态度，从中国古代教子童蒙“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违约”，到成人心灵契约的“君子一言，驷马难追”，都是对儒家诚信理念的践履。“自强不息”一词出自《周易》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儒家经典对“自强不息”“刚健有为”精神作了进一步诠释：“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中国几千年来发展，就是中国人坚持“自强不息”“刚健有为”的最好印证。

交互共进

在文化演进的链条上，人们基于其所生活时代的需要进行新的文化创造，并经由代代传承而积淀，使得文化成为一个不断增量的过程。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主流的儒学价值观“为哲学家所发明，政治家所强化，教育家 and 乡士文人所传播，最终由基层人民所实践，成为中国人族群的重要精神支柱与行为准则”。与此同时，在对传统的承继中，新的文化不断生长出来，成为新的传统的一部分。新的时代条件下，承继“旧传统”，培育“新传统”，并推动“优秀传统”在现代生活中达到“日用而不觉”的程度，需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坚持从“现实的人”和现实的需要出发，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传统习俗文化的有机融合。还要依靠日常生活的实践养成功能，通过“反求诸己”的方式，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核不断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对历史最好的继承就是创造新的历史，对人类文明最大的礼敬就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贯通历史的力量，文化力量，是过去、当下、未来并置融合的文化样态，也是生活世界不可或缺的文化元素和精神皈依。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关键在于融通历史、聚焦时代、守正创新，“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真正做到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实现传统与现代的有机衔接”，还要通过“出去分享其他民族的经验、宗教和伦理传统，通过更广泛的对话走向新的天地”，从而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加贴近现代生活、适应现代生活，融入现代生活，并在现代生活中达到“日用而不觉”的程度。

（作者为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文史哲》编辑部副教授）

新論語

礼乐被誉为“中国文化之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标志。礼，旨在规范外在行为；乐，重在陶冶内在情操。礼乐文化的精神渗透到古代中国的典章制度、伦理准则和个体身心修养等诸多层面，为中国人确立了共同的行为规范和价值体系，中华民族也因此成为多元一体的伟大民族。

礼乐文化的历史流变

礼乐源于“事神致福”的巫术仪式和祭祀活动。“礼”乃祭神的供奉，“乐”则是娱神的歌舞，先民们借此来表达自己对神的虔诚之心，以期获得神灵的庇佑，免灾致福。考古发现表明，在大汶口文化中晚期至龙山文化时期，礼乐在社会制度层面的初步建构就已生发，这在丧葬制度、祭祀制度、礼器制度等方面均有展现，奠定了中国礼乐文化发展的基石。

礼乐文化孕育于远古，兴起于三代，并在西周时期定型成熟。周人尊礼尚施，是典型的“尊礼文化”。从《周礼》《仪礼》《礼记》等文献的记载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西周时期的礼仪制度已相当完备，公务活动、生活日常、揖让进退等都有相应的礼乐体系进行规范。除了礼制的完备，周代尊礼还体现在礼乐文化的革故鼎新。在周代人看来，国家的兴衰存亡皆取决于“德”之有无与厚薄，周公制礼作乐，正是纳上下于道德，而合于天。诸侯、卿、大夫、士、庶民以成一道德之团体，换言之，西周时代在损益上古礼仪形式的同时，还赋予“礼乐”以“尊道崇德”“明德慎罚”等价值理念。尊礼崇德由此成为中国政治文化的鲜明底色。

如果说周公制礼作乐奠定了中华礼乐文化的社会基础，那么孔子则进一步将礼乐所蕴含的人文精神植根于中国人的内心。面对春秋末期礼崩乐坏、社会失序的社会现实，孔子深刻认识到，礼乐的形式并不能够使社会变得安定有序，如何让人们能够自觉地践行礼乐精神才是根本。于是，孔子一方面秉持损益之道，对传统礼仪、礼制乃至礼学文献都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整理；另一方面，孔子尤其重视在“人心”处用力，